

# 鹤壁刘庄墓地随葬陶器的初步研究<sup>\*</sup>

席乐

**摘要：**根据随葬陶器的类型学分析，鹤壁刘庄墓地可分为三期4段。墓地年代应属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文化因素分析表明，刘庄墓地所属的辉卫文化，有较多来源于白燕文化和东下冯文化的成分，但在其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仍然保持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互动。在稍晚的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刘庄墓地陶器风格还对郑洛地区有着一定的影响，但至二里岗文化上层阶段，其褐陶的传统逐渐消失。

**关键词：**刘庄墓地；陶器；辉卫文化；下七垣文化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pottery artifacts accompanying burials at the Liuzhuang Cemetery in Hebi, and divides the cemetery into three phases and four sub-pha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earthed pottery. By comparing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pottery from each phase with those from other typical contemporary sites and sorting out the developmental sequence of the pottery assemblage at the cemetery,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Liuzhuang Cemetery dates back to the second to the fourth phases of the Erlitou Cultur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ultural elements reveals that the Huiwei Culture, to which the Liuzhuang Cemetery belongs, absorbed a large number of cultural components from the Baiyan Culture and the Dongxiafeng Culture during its formative period.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ts own cultural system, the Huiwei Culture gradually forged a distinctive stylistic feature of its own while maintaining close and sustained cultural interactions with the surrounding cultural circles. In the late stage of the lower layer of the Erligang Culture, the pottery style of the Liuzhuang Cemetery exerted a certain degree of influence on the Zhengzhou-Luoyang region, which was the cultural core area at that time. Nevertheless, as the Erligang Culture entered the upper layer stage, the long-standing traditional brown pottery craftsmanship and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iwei Culture centered on the Liuzhuang Cemetery gradually faded and eventually disappeared in the cours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Key Words:** Liuzhuang Cemetery, Pottery, Huiwei Culture, Xiaqiyan Culture

<sup>\*</sup>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夏商时期社会认同研究——以考古材料为中心”（项目批准号：24FKGB00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阐释项目“商代墓葬礼制的综合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鹤壁刘庄墓地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大赉店镇刘庄南地。193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发掘过该墓地<sup>[1]</sup>。2005—200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进行了三次发掘,共计清理墓葬338座<sup>[2]</sup>。

刘庄墓地主体属于辉卫文化<sup>[3]</sup>,是目前已发表最为丰富的辉卫文化墓地材料。一般认为,辉卫文化是二里岗文化的来源之一,但过去所见辉卫文化的墓葬很少,对辉卫文化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刘庄墓地为进一步理解辉卫文化,进而讨论二里岗文化的渊源,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鹤壁刘庄》报告未对墓地进行全面的分期研究。此外,因相关材料是陆续公布的,学者们或仅依据简报材料进行分期<sup>[4]</sup>,或只对少数陶鬲进行分期<sup>[5]</sup>,对各墓的年代分歧也较大。比如,对刘庄墓地M24,就分别有二里头文化三期<sup>[6]</sup>、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sup>[7]</sup>、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sup>[8]</sup>、先商文化三段<sup>[9]</sup>等多种不同看法。故而,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刘庄墓地随葬陶器类型学分析入手,对墓地进行分期并确定其年代,再根据陶器文化因素,讨论不同的文化变迁、族群互动等相关问题。

## 一 类型学分析

### (一) 层位关系

刘庄墓地大部分墓葬开口于③层下,叠压打破关系较少,且多数打破关系中的墓葬无随葬品。经过对材料的系统梳理,兹选如下几组典型层位关系:

(1) 探方T5343②层→M10、M14、M15、M16、M39→③层→M85、M95、M139、M153、M195

(2) 探方T5344②层→M5、M11、M37→③层→M31、M51、M172

(3) 探方T4641③层→M261→M262

(4) 探方T4644③层→M22→M23

### (二) 典型器物型式分析

刘庄墓地随葬陶器主要有鬲、夹砂罐、豆、簋、圈足盘、鼎、束颈盆、平底盆、泥质罐、

鬻、角、爵、甗、尊、甗、罍、瓮、器盖等18类陶器,本文仅选取前9类出土数量较多、演变规律清晰的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

#### 1. 鬲

143件。夹砂陶,陶色多为灰黑色或褐色,器表颜色多不一,袋足,均有实足根,腹饰绳纹为主。其中27件因残损等原因,型式不明,其余根据腹部特征分为三型。

A型 106件。鼓腹。根据颈部特征分为三亚型。

Aa型 23件。高领,整体呈长方形。根据颈部、裆部特征分为二式。

演变规律:侈口逐渐明显,颈部逐渐变矮,袋足逐渐变瘦,实足根逐渐内收。I式,4件。标本M94:1(图一:1)。II式,19件。标本M37:1(图一:2)。

Ab型 71件。矮领,整体呈长方形。根据腹部、裆部特征分为二式。

演变规律:逐渐出现明显的肩部,最大腹径逐渐上移,分裆逐渐变矮,实足根逐渐变矮并内收。I式,31件。标本M159:3(图一:3)。II式,40件。标本M24:1(图一:4)。

Ac型 12件。矮领,整体呈正方形。根据颈部、腹部、裆部特征分为三式。

演变规律:侈口逐渐变卷沿,逐渐出现明显的肩部,最大腹径逐渐上移,分裆逐渐变矮,实足根逐渐变矮并内收。I式,5件。标本M10:2(图一:5)。II式,3件。标本M327:1(图一:6)。III式,4件。标本M240:4(图一:7)。

B型 9件。筒腹,袋足较瘦外撇。根据口部、腹部及整体特征分为三式。

演变规律:器体逐渐由长方形变成正方形,逐渐由侈口变卷沿,逐渐有明显的肩部,最大腹径逐渐上移,裆部逐渐变矮,实足根逐渐变细。I式,4件。标本M259:1(图一:8)。II式,3件。标本M126:2(图一:9)。III式,2件。标本M109:2(图一:10)。

C型 1件。垂腹。卷沿,薄胎,细绳纹。

见M330:1(图一:11)。

2.夹砂罐

42件。夹砂灰陶,侈口,平底,腹饰绳纹。其中3件因残损等原因,型式不明,其余根据整的数量分为两型。

A型 26件。无鬲。根据口部、腹部及整体特征分为三式。

演变规律:器体逐渐变矮,口沿由侈口变敞口,腹部逐渐变鼓。I式,8件。标本M18:1(图一:12)。II式,11件。标本M29:3(图一:13)。III式,7件。标本M16:1(图一:14)。

B型 13件。桥形鬲。其中1件残损,式别不明。

式别划分的依据及演变规律同A型。I式,5件。标本M193:2(图一:15)。II式,6件。标本M116:1(图一:16)。III式,1件。见

M14:1(图一:17)。

3.泥质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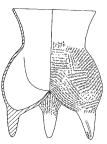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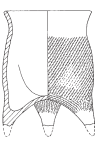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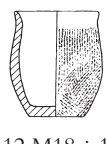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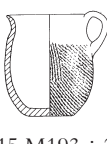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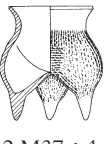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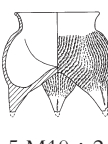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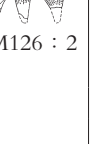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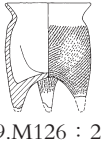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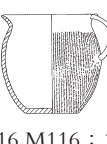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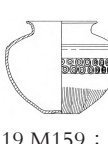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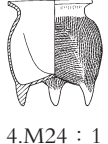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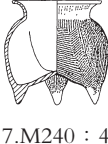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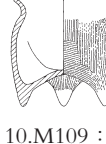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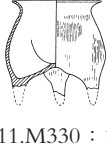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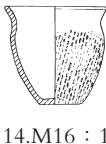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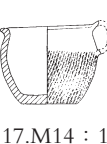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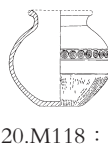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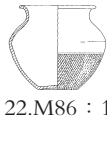
18件。泥质陶为主,束颈,平底为主。根据腹部及纹饰特征分为两型。

A型 6件。器体矮胖,腹部多饰凹弦纹。其中1件残损,式别不明,其余根据口部、肩部及纹饰特征分为三式。

演变规律:口沿由侈口逐渐变直口,折肩逐渐变圆肩,腹部以凹弦纹为主变为凹弦纹+涡纹+绳纹。I式,1件。见M105:1(图一:18)。II式,3件。标本M159:1(图一:19)。III式,1件。见M118:5(图一:20)。

B型 12件。器体较高,下腹多饰绳纹。其中2件因残损等原因,式别不明,其余根据口部及整体特征分为二式。

演变规律:器体逐渐变矮变胖,圆肩逐渐弧折。I式,3件。标本M117:4(图一:21)。

		鬲					夹砂罐		泥质罐	
		A型			B型	C型	A型	B型	A型	B型
		Aa型	Ab型	Ac型						
第一期	第1段									
	第2段									
第二期	第3段									
	第4段									

图一 鹤壁刘庄墓地陶器分期图(一)

(分别采自《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第114、51、188、36、17、354、266、285、154、132、358、26、42、26、221、139、26、129、188、145、143、104页)

Ⅱ式，7件。标本M86：1（图一：22）。

4.豆

66件。泥质黑皮陶为主，喇叭状底，器表多磨光。其中4件因残损等原因，型式不明，其余根据盘部、腹部及整体特征分为六型。

A型 32件。尖圆唇为主，浅盘，斜腹。其中1件残损，式别不明，其余根据盘部、柄部特征分为三式。

演变规律：沿面由无到出沿较宽，豆盘逐渐变浅，柄部逐渐变细变高，喇叭状底逐渐变高，柄及底由素面变为饰凹弦纹。Ⅰ式，2件。标本M193：1（图二：1）。Ⅱ式，21件。标本M37：2（图二：2）。Ⅲ式，8件。标本M99：5（图二：3）。

B型 21件。圆唇，浅盘，弧腹。根据沿部特征分为两亚型。

Ba型 15件。沿外翻。其中1件残损，式别

不明，其余根据盘部、柄部特征分为两式。

演变规律：豆盘逐渐变浅，弧腹内收逐渐不明显，豆柄逐渐变矮变粗，喇叭状底逐渐变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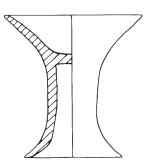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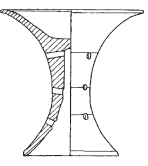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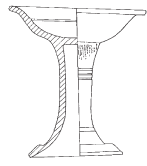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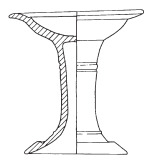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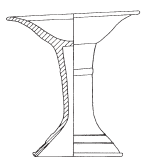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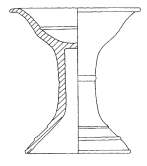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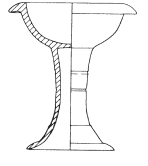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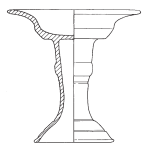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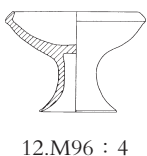
Ⅰ式，4件。标本M105：2（图二：4）。Ⅱ式，10件。标本M42：2（图二：5）。

Bb型 6件。出沿较宽。根据沿部、柄部特征分为两式。

演变规律：出沿逐渐变窄，豆盘逐渐变深，豆柄逐渐变矮，喇叭状底逐渐变高。Ⅰ式，3件。标本M69：2（图二：6）。Ⅱ式，3件。标本M176：3（图二：7）。

C型 3件。圆唇，深腹。根据柄部及整体特征分为两式。

演变规律：器体逐渐变矮胖，口沿由外翻变卷沿，豆柄变矮变粗，喇叭状底变高。Ⅰ式，2件。标本M99：1（图二：8）。Ⅱ式，1件。见M66：2（图二：9）。

		豆						
		A型	B型		C型	D型	E型	F型
			Ba型	Bb型				
第一期	第1段	 1.M193：1					 10.M97：3	
	第2段	 2.M37：2	 4.M105：2	 6.M69：2				
第二期	第3段	 3.M99：5	 5.M42：2	 7.M176：3	 8.M99：1		 11.M327：2	
	第4段				 9.M66：2			 12.M96：4

图二 鹤壁刘庄墓地陶器分期图（二）

（分别采自《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第221、51、122、129、55、84、205、122、81、118、354、118页）

D型 2件。深盘，斜腹。标本M97：3（图二：10）。

E型 2件。器体较大，出沿较宽，深盘，斜折腹，高柄。标本M327：2（图二：11）。

F型 2件。微敛口，深盘，粗柄。标本M96：4（图二：12）。

#### 5.圈足盘

21件。泥质陶，圆唇，沿面多较窄，浅盘，圈足，器表多磨光。其中4件因残损等原因，式别不明，其余根据盘部、圈足特征分为三式。

演变规律：盘身逐渐变深，圈足逐渐变矮变粗。I式，7件。标本M287：2（图三：1）。

II式，5件。标本M40：2（图三：2）。III式，5件。标本M99：2（图三：3）。

#### 6.鼎

9件。泥质陶，卷沿，束颈，折腹，平底，侧装扁三角形足，器表磨光。根据沿部、颈部及腹部特征分为三式。

演变规律：沿面卷曲逐渐明显并出沿，颈部逐渐变高，口径逐渐大于最大腹径，腹部逐渐变浅。I式，1件。见M236：5（图三：4）。II式，3件。标本M308：2（图三：5）。III式，5件。标本M87：2（图三：6）。

#### 7.簋

8件。泥质黑皮陶为主，平底，圈足，器表磨光。根据口部及腹部特征分为二型。

A型 6件。敞口，鼓腹。其中1件残损，式别不明，其余根据沿部、圈足特征分为三式。

演变规律：沿面逐渐变宽，出现束颈，圈足逐渐变细变高。I式，1件。见M97：1（图三：7）。II式，3件。标本M4：2（图三：8）。III式，1件。见M29：2（图三：9）。

B型 2件。敛口，叠唇，斜弧腹内收，矮圈足，素面。标本M189：2（图三：10）。

#### 8.束颈盆

26件。泥质陶为主，束颈，平底为主。根据器体大小分为两型。

A型 17件。器体较大，制作精细。根据沿部、腹部特征分为三式。

演变规律：出沿逐渐变宽，束颈逐渐不明显，腹部逐渐变浅。I式，8件。标本M83：2（图三：11）。II式，4件。标本M86：3（图三：12）。III式，5件。标本M136：1（图三：13）。

B型 9件。器体较小，制作粗糙。根据沿部、腹部特征分为三式。

演变规律：卷沿逐渐明显，沿面逐渐变宽，束颈逐渐明显，腹部逐渐变鼓。I式，2件。标本M97：2（图三：14）。II式，4件。标本M5：2（图三：15）。III式，3件。标本M46：3（图三：16）。

#### 9.平底盆

32件。泥质陶，斜浅腹，平底，腹部饰绳纹为主。其中10件残损，型式不明，其余根据纹饰特征分为两型。

A型 9件。器表多素面或饰凹弦纹。根据沿部、腹部特征分为二式。

演变规律：无沿逐渐变为窄卷沿，腹部与底部夹角逐渐变小，腹部由素面为主到饰凹弦纹。I式，2件。标本M103：2（图三：17）。II式，7件。标本M240：2（图三：18）。

B型 13件。器表多饰绳纹。根据沿部、腹部特征分为二式。

演变规律：无沿逐渐变为宽卷沿，腹部逐渐变浅，腹部与底部夹角逐渐变小。I式，4件。标本M117：5（图三：19）。II式，9件。标本M71：2（图三：20）。

## 二 分期与年代判断

根据陶器不同类、型、亚型在典型单位的有无与共存状况，及典型器类式别特征的差异程度，可将刘庄墓地归并为三期4段（表一）。

### （一）分期依据

#### 1.第1段与第2段的依据

第2段新出现了Ac型鬲、B型豆、B型平底盆、圈足盘、A型泥质罐，并都形成了演变序列。

第1段与第2段之间还有直接的层位关系：M10、M15、M39→③→M95、M195，因而早晚

	圈足盘	鼎	簋		束颈盆		平底盆	
			A型	B型	A型	B型	A型	B型
第一期	第1段							
	第2段							
第二期	第3段							
	第4段							
第三期	第3段							
	第4段							

图三 鹤壁刘庄墓地陶器分期图(三)

(分别采自《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第316、55、122、263、336、108、118、13、42、218、99、104、157、118、17、61、124、266、143、89页)

关系明显。

又第1段和第2段在陶质、纹饰、器类和器物特征等方面比较接近，故而将其合并为一期。

2.第2段与第3段的依据

第3段除继承上述前两段器物外，新出现Ab型鬲、C型豆、E型豆、鼎、B型泥质罐，除了E型豆外其他器物都形成了自己的演变序列。第3段器物组合种类和单墓随葬陶器的数量均多于第2段。

第2、3段还有直接的层位关系：M22→M23，因而早晚关系明确，故而将第2、3段分开。

3.第3段与第4段的依据

第4段新出现F型豆，簋类消失，第3、4段常见的Ab型鬲和鼎与淇县宋窑遗址的三个单位的鬲和鼎<sup>[10]</sup>相近(三者之间的关系为：T302③→H50→T302⑩)，也与《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潞王坟—宋窑类遗存”第二、三期的鬲和鼎相似<sup>[11]</sup>。

(二) 各期特征

1.第一期

包括第1、2段。

第1段的陶质以夹砂灰陶、褐陶为主。第2段出现少量夹砂灰黑陶和泥质黑皮陶。其中褐陶多颜色不一，制作粗糙，陶胎较厚。

第1段的纹饰以绳纹为主，粗绳纹、细绳纹比例相当。第2段出现少量涡纹。

第1段的器类以Aa型鬲、夹砂罐、A型豆、束颈盆为主。第2段出现泥质罐、圈足盘等，但数量极少。

第1段器物的特征如下：鬲，器体较高，分裆较高，足根外撇。夹砂罐，微侈口，瘦腹，平底。豆，多为浅盘，斜腹，粗柄，喇叭状底较矮。簋，沿面较窄，弧腹，圈足粗矮。束颈盆，深腹，平底为主。平底盆，多无沿。第2段器物的特征有：鬲，器体变矮，分裆变矮，足根不外撇。豆，浅盘，弧腹，细柄。簋、束颈盆、平底



盆与前段相比变化不大。

### 2. 第二期

包括第3段。相较于前一期，夹砂灰黑陶、泥质黑皮陶比例明显上升，灰陶陶色逐渐变浅。

陶器纹饰仍以绳纹为主，不过粗绳纹明显多于细绳纹，并有一定数量的凹弦纹。

相对上一期，绝大多数陶器器类均出现，圈足盘、平底盆、泥质罐数量大增，C型豆、E型豆、鼎、爵、鬻等开始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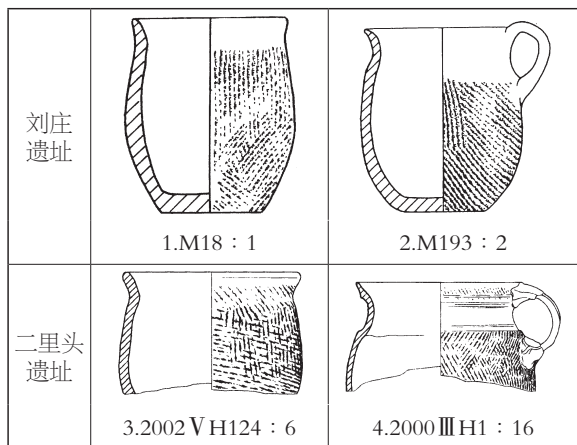
鬻，多数为卷沿，有肩，分裆变矮，足根多外撇。夹砂罐，器体变矮，卷沿较甚，鼓腹。豆，整体变高，出沿更加明显，盘更浅，高柄，喇叭状底较高。新出现一种圆唇，口沿外翻，深腹，细柄豆；一种器体较大，出沿较宽，深盘，斜折腹，高柄豆。圈足盘，深盘，圈足较粗。新出现的鼎，多为泥质磨光黑皮陶，卷沿，束颈，折腹，平底为主，侧扁半月形足。簋，多为宽卷沿，微束颈，圈足细高，腹部多饰涡纹。束颈盆，束颈不明显，浅腹，多凹圆底。平底盆，多卷沿，腹部变浅。

### 3. 第三期

包括第4段。绝大多数为夹砂灰陶，此期的黑皮陶制作最为精致。

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出现下七垣文化的极细绳纹，圈足盘、平底盆、豆等器物上较多见凹弦纹。

陶器器类以鬻、夹砂罐、豆、平底盆为主，



图四 鹤壁刘庄墓地一期陶器对比图  
 (3、4分别采自《二里头(1999—2006)》，第58、221页)

圈足盘、鼎较常见，簋基本不见。

鬻，多为方形，矮束颈，矮分裆，足根较短，出现薄胎细绳纹卷沿鬻。夹砂罐，矮束颈，鼓腹。豆，出现一种微敛口，深盘，粗柄豆。圈足盘，整体呈方形，厚重，圈足较粗。鼎，出沿，高领，口径大于腹径，多饰有纹饰。

### (三) 年代判断

前文已提及各学者对于墓葬年代分歧较大，究其缘由主要是学者们判断年代的标准不尽相同，在没有科学测年的情况下，我们主要以这一时期核心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分期为参照，选取夹砂罐、鬻等演变明显的器物为代表，来判断鹤壁刘庄墓地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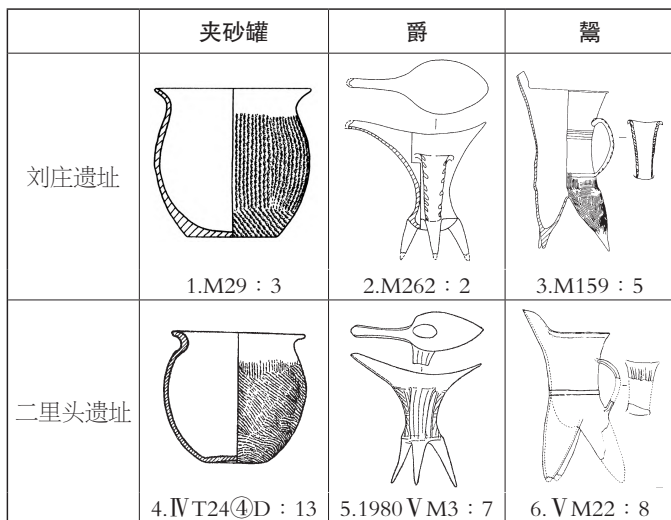
第一期的夹砂罐M18 : 1、M193 : 2均微侈口，瘦腹，平底，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同类器2002 V H124 : 6、2000 III H1 : 16<sup>[12]</sup>特征接近(图四)，所以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

第二期的夹砂罐M29 : 3侈口较甚，鼓腹，与二里头遗址IV T24④D : 13<sup>[13]</sup>特征接近。爵M262 : 2与二里头遗址1980 V M3 : 7<sup>[14]</sup>相近。鬻M159 : 5与二里头遗址V M22 : 8<sup>[15]</sup>相近(图五)，李志鹏认为后者应属二里头文化三期<sup>[16]</sup>。上述二里头遗址陶器的年代均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所以我们认为第二期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

第三期的夹砂罐M14 : 1短束颈，鼓腹，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同类器2003 V M8 : 3<sup>[17]</sup>接近。第二、三期常见的Ab型鬻、鼎与《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潞王坟—宋窑类遗存”第二、三期的同类器相似，而后者三期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sup>[18]</sup>(图六)。要之，我们认为第三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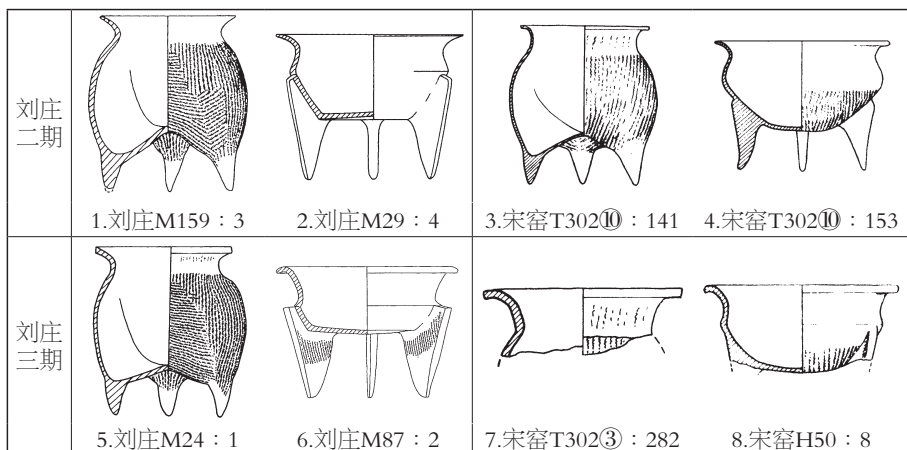
### 三 文化因素分析及族群互动

鹤壁刘庄墓地随葬陶器来源较复杂，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后，仍保持与周边文化的互动，下面对其文化因素进行详细分析。



图五 鹤壁刘庄墓地二期陶器对比图

(2、3分别采自《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第291、188页；4、6分别采自《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206、134页；5采自《考古》1983年第3期，第203页)



图六 鹤壁刘庄墓地二、三期陶器对比图

(2采自《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第42页；3、4、7、8分别采自《考古学集刊》第10集，第107、110、108、110页)

A组 来源于白燕文化<sup>[19]</sup>。是刘庄墓地随葬数量最多的陶器种类，构成了辉卫文化的主要器类，包括Aa型鬲、Bb型豆、A型束颈盆、B型平底盆等(图七)。

B组 来源于东下冯文化<sup>[20]</sup>。主要器类包括夹砂罐(图一:12、15)、甗等。

C组 来源于二里头文化。主要器类包括Ba型豆、C型豆、鬯、爵、角等(图二:4、5、8、9,图五:2、3)。

D组 来源不明或自身因素。主要器类

包括Ab型鬲、Ac型鬲、A型豆、E型豆、鼎、簋、圈足盘、甗等(图一:3~7,图二:1~3、11,图三:1~10)。

E组 来源于下七垣文化。主要为薄胎细绳纹卷沿鬲(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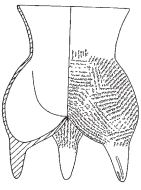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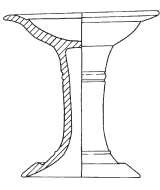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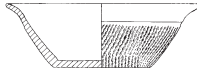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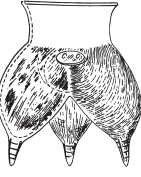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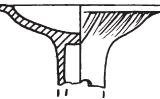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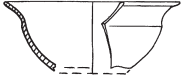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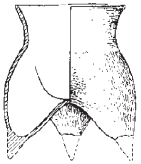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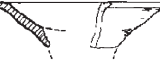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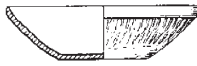
以上对刘庄墓地陶器的文化因素分析，为探讨刘庄墓地的陶器风格如何形成，以及研究刘庄墓地所属的辉卫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互动等相关问题，提供了基础。

刘庄第一期，主要由A、B、D组因素组成，其中又以A、B组最多，构成了辉卫文化典型器类。与第二、三期相比，A、B组器物分别与白燕文化和东下冯文化同类器如出一辙。需要说明的是，A组器物也是下七垣文化的第一期主要器类，或许暗示

了晋中地区的白燕文化对两个区域的影响。此外，辉卫文化中较为常见的褐陶在这一时期已经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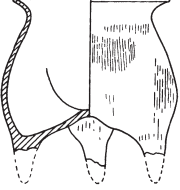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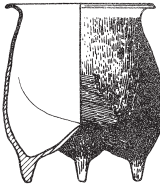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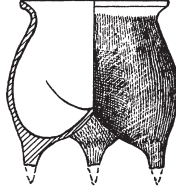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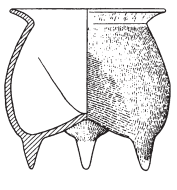
刘庄人群在第二期形成了自己的陶器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持了褐陶的烧制传统。二是这一时期陶鬲不仅与白燕文化的陶鬲特征区别明显，

与下七垣文化的薄胎鬲也不同。三是B组因素与东下冯文化区域的陶器演变规律不一致。四是新创了鼎、C型豆、E型豆等，虽然刘庄墓地陶器制作相对粗糙，但这类器物制作越发规整。需要注意的是，这类鼎在郑州商城遗址也有发现<sup>[21]</sup>，笔者曾见过豫北地区出土的几件完整器，不同于同时期的夹砂鼎，此类鼎多为泥质陶、施有陶衣、磨光，暗示其并非日常炊器，可能与二里头文化的爵、鬯、盃等陶器有相似的功用。C组在二里头文化中有礼器的性质，特别是

	鬲	豆	束颈盆	平底盆
刘庄遗址	 1.M94 : 1	 2.M69 : 2	 3.M83 : 2	 4.M117 : 5
游邀遗址	 5.H129 : 6	 6.H611 : 11	 7.H584 : 12	 8.H129 : 14
杏花村遗址	 9.H313 : 1	 10.H20 : 5		 11.06

图七 刘庄遗址 A 组器物群图

(5~8 分别采自《忻州游邀考古》，第 85、116、113、113 页；9~11 分别采自《晋中考古》，第 160、147、145 页)

 1.刘庄M330 : 1	 2.何庄H1 : 1	 3.鹿台岗H39 : 6	 4.鄆邓H7 : 3
---	---	---	--

图八 各遗址漳河型鬲对比图

(2 采自《华夏考古》1992 年第 4 期，第 13 页；3 采自《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第 94 页；4 采自《安阳鄆邓》，第 110 页)

鬲多为白陶，采用高岭土烧制，而刘庄墓地出土的 C 组器物与墓地大部分器物的陶质、陶色、火候基本一致，暗示此类陶器为本地制造，或许是刘庄有人来自或去过二里头文化区域。

第三期刘庄人群继续保持自己的陶器风格。这一时期出现了下七垣文化的薄胎鬲，如刘庄 M330 : 1 与何庄 H1 : 1<sup>[22]</sup>、鹿台岗 H39 : 6<sup>[23]</sup>、鄆邓 H7 : 23<sup>[24]</sup> 等陶鬲高度一致（图八）。在

下七垣文化南下的大背景下<sup>[25]</sup>，临近下七垣文化区域的刘庄，出现极少数的下七垣文化陶器，暗示刘庄可能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小聚落。

二里头文化三期，郑洛地区的偃师二里头遗址<sup>[26]</sup>、新密曲梁遗址<sup>[27]</sup> 都开始出现辉卫文化的陶鬲，可能是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传播的现象。其后在偃师二里头、荥阳大师姑<sup>[28]</sup>、新郑望京楼<sup>[29]</sup> 等遗址发现更多辉卫文化的陶器，至二里岗文化下层一期前后，郑州商城的老坟岗<sup>[30]</sup>、南关外<sup>[31]</sup> 出现了成组的辉卫文化陶器，表明辉卫文化人群曾在郑州生活过<sup>[32]</sup>。二里岗文化形成后，郑州商城遗址<sup>[33]</sup> 和偃师商城遗址<sup>[34]</sup> 仍可见到少量辉卫文化传统的陶器，但数量逐渐减少并最终消失。与此同时，二里岗文化扩张的大部分区域，如垣曲商城<sup>[35]</sup>、夏县东下冯<sup>[36]</sup>、西安老牛坡<sup>[37]</sup> 等遗址基本不见辉卫文化传统的陶器，只是武汉盘龙城<sup>[38]</sup> 和荆州荆南寺<sup>[39]</sup> 等遗址一直存在辉卫文化传统的陶器。

#### 四 结语

本文通过对鹤壁刘庄墓地随葬陶器的分期等相关问题的讨论，得到了以下几点认识：

1. 墓地可分为三期 4 段，通过对墓地典型器物的发展序列及各期陶器形制特征与其他典型遗址比对，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刘庄墓地一至三期的年代分别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

2.文化因素分析表明,白燕文化和东下冯文化是刘庄墓地辉卫文化风格的主要来源。但在其后,刘庄人群不仅保持了烧制褐陶的传统,还发展了鼎、圈足盘等新的礼器,形成了自己的陶器风格。第二期出现的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陶礼器,表现出本地制造的风格,暗示了刘庄与二里头文化区域可能存在着人员互动。而临近下七垣文化区域,却少见下七垣文化的陶鬲、橄榄罐等典型陶器,暗示刘庄可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聚落。

3.二里岗文化形成前后,辉卫文化风格陶器已经出现在郑洛地区。但在二里岗文化陶器风格形成后,辉卫风格陶器在郑洛地区却少见,同时期其他二里岗文化遗址也出现同样的现象,只在武汉盘龙城、荆州荆南寺等遗址大行其道,这是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本文对鹤壁刘庄墓地随葬陶器的初步研究,只是一种尝试,所得认识还有待更多材料佐证。

附记:本文草成于2017年5月,在成稿过程中得到了朱光华、刘绪、雷兴山、张昌平等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注释:

- [1] 郭宝钧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浚县辛村》,第5页,科学出版社,1964年。
- [2] 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鹤壁市刘庄遗址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第3期;  
 b.河南省文物局编著:《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
- [3] 关于豫北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性质,一直以来争议较大。我们认为这一时期豫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文化、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故而,本文同意张立东的观点,认为豫北地区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可以命名为“辉卫文化”。同时本文的“下七垣文化”的概念则采取《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观点,参见杨锡璋、高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

卷》,第1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4] a.李维明:《河南鹤壁刘庄先商文化墓地初析》,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6集,第193~199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b.常怀颖:《夏商之际豫北诸遗存的年代与性质》,《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6期。
- [5] a.朱延平:《豫北冀南地区的陶鬲》,故宫博物院编,杨晶主编:《中国陶鬲谱系研究》,第289~303页,故宫出版社,2014年;  
 b.田建文:《晋中及陕晋豫地区的陶鬲》,故宫博物院编,杨晶主编:《中国陶鬲谱系研究》,第185~260页。
- [6] 李维明:《河南鹤壁刘庄先商文化墓地初析》,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6集,第196页。
- [7] 河南省文物局编著:《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第379~380页。
- [8] 同[4] b。
- [9] 李素婷:《豫北地区漳河型先商文化的特征、来源及相关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 [10] 张立东:《论辉卫文化》,《考古》编辑部编辑,王仲殊主编:《考古学集刊》第10集,第210页,地质出版社,1996年。
- [11] 杨锡璋、高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58页。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1999—2006)》,第58、221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20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31、134页。
- [16] 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 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第9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1999—2006）》，第61页。
- [18] 杨锡璋、高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57~160页。
- [19] 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辉县孟庄》，第38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b.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 忻州考古队编著：《忻州游邀考古》，第85~116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c. 国家文物局等：《晋中考古》，第127~163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 [20] a. 郑杰祥著：《夏史初探》，第246~25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b. 于孟洲：《东下冯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比较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春秋》2004年第1期。
- [2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郑州商城陶器集萃》，第37页，大象出版社，2015年。
- [22] 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永年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永年县何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2年第4期。
- [23]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编著：《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第94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 [2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鄆邓》，第110页，大象出版社，2012年。
- [25] a. 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等：《河南长垣宜丘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5年第2期；  
 b.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编著：《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第88~116页；  
 c. 宋豫秦：《论杞县与郑州新发现的先商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33~14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d. 袁广阔：《河南长垣宜丘遗址发掘的意义》，《中原文物》2013年第4期；  
 e. 王立新、胡保华：《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八）——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文集》，第179~193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1999—2006）》，第68页。
- [27]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新密曲梁遗址1988年春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 [28]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大师姑》，第50、225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 [29] 顾万发主编，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新郑望京楼：2010—2012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第172、216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 [3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老坟岗商代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9年第4期。
- [31]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 [32] 王立新、胡保华：《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八）——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文集》，第193页。
- [3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商城》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
- [35]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编著：《垣曲商城（一）：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 [37] 刘士莪编著：《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 [3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 [39] 荆州博物馆编著：《荆州荆南寺》，文物出版社，2009年。

（责任编辑：董杨）